

已，接著朝鮮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亞洲是一個非常不堪的狀態，但是過了100年，這100年發生了許多的變化。作為想像的下一個50年（也就是各位大概到我這個年齡的50年後），想像50年前的變化跟現在的變化，請各位去猜測從現在開始50年後的變化。請各位注意自己的健康，創造美好的社會。謝謝。

辛亥革命新論*

溝口雄三 作／林少陽 譯

前言

中國歷史上有四大變動：秦漢帝國的建立、唐宋變革、明末清初的轉換、清末民初的激變。導致第四次變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歷史特質在於如下幾點：(1)這是一場導致持續二千年之久的王朝體制崩潰的革命；(2)其形態採取了各省獨立的形態；(3)其結果是舊體制的解體，革命後國內紛呈四分五裂之狀；(4)實現革命的主要勢力，並非傳統型的叛軍或異族軍隊，而是下面將談及的蓄積於民間的「各省之力」¹〔日文為「省の力」〕等。這一無中央的革命，視其角度，其形態似為一場無國家的革命。因此，在國際社會紛紛謀求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現代民族國家之大環境中，其革命的形態，只能被視為亡國的混沌之兆。二千年來王朝體制終結，此乃中國歷史的空

* 編註：本文為溝口雄三教授來台講座後於2007年11月27日定稿，前稿為〈激烈動蕩的清末民初〉。本篇論文後的三位作者的回應文，是針對溝口教授2007年5月11日講座談話與前稿所作。

1 這裡的「各省之力」，指的是軍事力量（以湘軍等地方武裝為基礎的省規模的團練等）、行政力量（實現鄉治的力量，如善會、善堂等）、社會力量（宗族所擁有的社會影響力等）、經濟實力（商業實力）等「民間」的綜合性力量。

前大事件，而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視其若朽木之終，自然之勢而已。因此，其歷史意義不僅未被同時代人所關注，亦被後人所輕視。觀之於現代日、中歷史教科書，這一點了然所見。這一類教科書大都枚舉農民暴動之頻發、官僚之腐敗、財政之窘迫、軍隊之弛緩等，視諸如此類事例為清朝「衰落」之因，而不察此類事例實頻見於所有王朝的終結之時。這些教科書都未能注意到，代之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獨立的形態實現辛亥革命的各省的「各省之力」。

所謂各省獨立，乃拜成熟達至獨立的「各省之力」之所賜。姑且先交代本文結論的話，16、17世紀明末清初的「鄉里空間」²乃是「地方公論」³展開的空間，其規模由明末的縣一級擴充至清末的省的範圍。「各省之力」成熟的軌跡，顯見於這一地方力量擴大、充實的過程。然而，這一傳統的軌跡卻被「現代化」史觀或「革命」史觀所遮蔽，因而被隱而不見。

非但如此，現代化史觀以建立中央集權制現代「民族國家」為現代化課題，若以此觀之，辛亥革命只能是現代化之反動。若從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課題觀之，辛亥革命與1949年的建國革命相比，則只能是不徹底的革命。

職是之故，辛亥革命被視為一次迷失方向、逆而為之的混沌，建國革命則被視為以成就民族國家為目的的「由起點至目的地」的構圖。

2 之所以使用「鄉里空間」這一說法，是因為以往在討論中國的鄉村自治時，「國家」與「社會」這一二分法範疇常被使用。但是，「省力」是作為官、紳、民三者相交的網絡而存在。本文姑且在此將這三者的混合，換言之也是「國家」與「社會」的混合冠以「鄉里空間」這一稱謂。

3 明末顯見的趨勢是「以地方公議推進地方行政，地方人士自己調整利害關係」，以探求「新的社會秩序」。請參見夫馬進(1980)〈明末反地方官事變〉(明末反地方官土變)·《東方學報》(京都)，52期；小島毅(1998)〈中國近世的公議〉(中国近世の公議)·《思想》(東京：岩波書店)，889號。

或者辛亥革命被視為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而與後者相配套的觀點，則是視建國革命為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由淺而深」的構圖，乃是以往廣為通用的視點。

但是，辛亥革命與建國革命之間的關係，本非只是依據革命的淺深程度所劃分的階段性關係，亦非視兩者為起點與目的的單向排列關係。

兩個革命，若坦然視之為由舊體制崩潰至新體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連續性現象，則可以視這兩個革命在運動方向性上雖處於(分權與集權的)相反關係，但這一對革命卻又被因果地(以破壞後重建的方式)連繫在一起。若從現象的角度看，則是將暫時令中央解體的分權勢力再度集結起來，進而建立新的中央集權，因而是一場過程曲折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時，並無預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體制(如前所述，並非是以某一新體制為目標，而只是令其解體，這是辛亥革命的特質之一)。其時的可能性可謂多種多樣：或以新的王朝體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或各省聯合的聯邦制共和國，或軍閥之割據分裂，或列強之瓜分統治，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權制民族國家。作為理論可能性，任何一種選擇都有可能。但是，以今日之視點事後觀之，中國之歷史大勢是38年後實現的中央集權制和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不過兩場革命之間是「瓦解與重建」這一互為表裡的因果關係，兩者接合了某種既排斥又繼承、既斷絕又連續之類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建國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歷史性格所規定的。無論如何，兩個革命的關係中所潛在的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問題，大概都可作為21世紀中國的「封建·郡縣」問題而被討論。

儘管如此，從1911年的解體至1949年的再統一為止，38年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是，也可以反過來認為，需要如此漫長的時間，恰恰證明這一動盪的確處身於歷史的重大轉換期之中。如唐宋轉型(內藤湖

南所說的由貴族社會往平民社會的轉換)過程中，五代的分裂割據長達53年之久。

也就是說，辛亥革命與建國革命，是一個以千年為單位的大轉換。其變革之烈，堪與秦漢帝國成立以來的唐宋變革期相提並論(日本之所以侵略得逞，正因為是乘大變革之混亂)。

下面筆者將依據此觀點考察清末民初之劇變。

(一)觀察清末的視角座標

我們先來討論觀察清末的視角座標。

中國史習慣上在時間劃分上將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的時間稱為「近現代」，之後至現在則稱為「現代」。

這一視鴉片戰爭之後為「近現代」的歷史劃分，產生於1920至19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封建社會論爭」。這一論爭基於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其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它成為中國歷史學界的正式劃分法。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至今仍沿用此體例。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界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慢慢接受了這一劃分法。因此，談起中國近現代史，大家便會心照不宣地意指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

不過，日本戰前的東亞史教科書則根據傳教士到來等史實，將16至17世紀以降劃為西學或西力東漸時期。現在的世界史教科書繼承了現代歐洲形成這一劃分視點，鴉片戰爭作為一部分，被包含在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現代性(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整體性構圖之中。同樣一個鴉片戰爭，在中國卻是近現代之開始。因此，兩者之間有著微妙的差異。亦即是說，就算依據鴉片戰爭或近代視角座標，它也有著兩面：一面是以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為革命方針意義上的革命

史觀，另一面則是偏重於質疑歐洲近代文明之亞洲東擴意義上的文明史觀。

觀之於中國近現代研究的現場，雖然這兩面帶來了方法論上不小的差異，但兩者在視歐洲資本主義文明(帝國主義)東擴為亞洲歷史轉機的主要或最大要因這一點上，卻又是一致的。

鴉片戰爭所象徵的19世紀東亞的東西文明接觸，與以前的接觸迥然有異。首先，它立足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為謀求市場而不惜行使武力。它也作為帝國主義現代性，為殖民地統治而強迫對方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進行結構性變革。職是之故，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現代之開始，於中國而言，它意味著這一歷史劃分基於對自有文明存亡危機的自覺之上。誠然，鴉片戰爭(1840年)以後，如下的歷史事件接踵而至：印度莫臥兒王朝的崩壞與英國直接的殖民地統治(1858年)，英國吞併緬甸(1886年)，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的成立(1887年)，菲律賓淪為美國殖民地(1898年)，印尼淪為荷蘭殖民地(1904年)，韓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等等。中國知識分子多年來親身目睹了這一系列變化，特別是在1920至30年代，於中華文明而言這些事件無非警示著自身生死存亡的危機。

因為中華文明圈歷史悠久，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尤為強烈。民族自尊心愈強，其危機感愈烈。由後而反顧，亦即以現代的眼光回望，當時他們對「危機」明顯是過度的反應。他們中的大部分矯枉過正，視中國文化為劣等，否薄自身的歷史。所以，今人並不可將其時中國知識人的歷史認識和現實認識原封不動地等同於對客觀事實的說明。這一做法明顯有著主觀的偏差。

比如陳獨秀說：「西洋民族自古迄今，……一切倫理、道德、政治、社會之所嚮往，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東洋民族，自游牧社會進而為宗法社會，至今無以異焉。……自酋長政治進

而為封建政治，至今無以異焉。……忠孝者，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半開化東洋民族一貫之精神也」⁴。如其所示，這裡的「東洋」亦即中國，它被認為仍停留於「半開化」的「封建時代」這一歷史階段。所謂「半開化」，也就是將中國定位於文明與野蠻的中間，其所處歷史階段與歐洲相比整整滯後半個階段。

他們大多並非客觀觀察中國的歷史過程，而是視歐洲的歷史過程為楷模，然後將中國削足適履地按這一模式進行解釋，最後根據這一解釋設定民族的課題。

如前所述，鴉片戰爭視角座標或近現代視角座標產生於中國，乃拜馬克思主義者的封建社會論爭所賜。他們所憧憬的，是歐洲現代性形成這一絢麗多彩的歷史圖景。

這一歷史圖景通常是這樣被敘述的：歐洲現代性形成所依靠的，是否定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產業革命、市民革命等現代性大事件孕育於中世紀、於反抗中世紀中脫穎而出，因此，在此意義上，這一現代性敘事是一齣包含後現代思潮並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不折不扣的系列連續劇。

然而，將這一歐洲獨特的故事置於中國的場景中進行觀察的話，首先，在制度上中國本來便不存在教會統治體系和封建領主制。所以，中國本來便沒有一個脫胎於反叛中世紀的宗教改革和產業革命或市民革命——總之，它沒有一個作為歷史內核的所謂資本主義現代性——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似是而非的假性存在。因此，只要視歐洲為基準，便只能得出中國沒有所謂「現代(性)」的單色調而不無片面的結論。

對於1920至3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其歷史認識的障

4 陳獨秀(1918)〈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

礙在於中國歷史中並不存在封建領主制的中世紀。相反，被視為歐洲古代之象徵的帝制統治體制，卻自秦漢帝國成立以來，綿延不斷長達二千餘年之久。以歐洲模式為準卻彰顯了這一歷史類型本身巨大的差異，亦即中國並無抗爭的中世紀，因而也就不存在這一抗爭創造物的現代(性)。結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便提出了一個假說：設定了周秦以來達三千年之久的王朝與地主主宰的封建統治，「至19世紀中葉，因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這個社會的內部首先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也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後，王朝封建統治的延續狀態被打破，不徹底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即半封建的現代性和帝國主義強權統治之下半殖民地狀態的現代性便成型了。這便是他們構築的「半」現代性敘述。

在中國被列強侵略之時，對於謀求民族獨立、以被壓迫階級的民主主義解放為目標的中國改革者來說，這一「半」現代性敘述與其是構築性敘述，莫若說是方針，甚至有時還是革命的實踐指南。將中國從半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使占人民中大多數的農民脫離半封建狀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民族國家，這是他們的革命目標。至少至20世紀後半期，「鴉片戰爭(或現代性)」視角座標尚還是有效的。

但是，事後觀之，其有效性過於政治性，時而甚至是非歷史的。

此類的例證之一是對辛亥革命歷史的解讀。依照時間的推移平實地觀察歷史的話，辛亥革命結束了持續兩千餘年的秦漢帝國以來的王朝體制，這顯然是世界史意義上的大事件。而且，尤其應注意到的是，它亦非採取了由諸如革命派中央軍、民眾亂軍推翻皇權之類的模式，而是各省擺脫中央宣佈獨立。這一形態的革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但是，「鴉片戰爭(或現代性)」史觀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卻遠遠遜色於1949年的建國革命。1949年的建國革命被視為一場實現了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目標的革命，而恰恰在此目的上，辛亥革命則被視

為是不徹底的。最近，日本的近代中國史研究界對這一革命一元史觀有所反省，有的研究將從辛亥革命至建國革命為止的38年作為國民革命期或民國期，並嘗試從中發現其獨特的歷史性格。但這一類的研究依然將辛亥革命當作國民革命的起點，亦即是說，此一觀點仍囿於以建國革命為目的的目的史觀中。這一類觀點與革命一元史觀並無二致。

其局限性在於，「鴉片戰爭(或現代性)」視角座標並非提取自中國歷史的洪流，而是建構於外來的危機之中。

在此談論「鴉片戰爭(或現代性)」視角座標之問題所在，並非是否定這一視角座標本身。這一視角座標以前在闡明近代中國的歷史軌跡上貢獻良多，今後亦將依然有效。在此只是想指出，僅僅依據這一視角座標，將難於窺見醞釀了辛亥革命的近代中國的歷史全貌。至少為了更立體地凸顯近代中國的全貌，我們必須依據下列16至17世紀視角座標。

所謂16至17世紀視角座標，指的是承認明末清初的歷史變動，並且認為這一變動貫穿整個清代，其發展直至清末的動盪期是一個長期的俯瞰性視角座標。直截了當地說的話，這一視角座標就是為捕捉上述「各省之力」，並將之視為革命之力。依據這一視角座標觀察清末之劇變，與依據「鴉片戰爭(或現代性)」視角座標觀察清末劇變，其實是大相徑庭的。

依據這一16至17世紀視角座標，我們將重視辛亥革命的事件性，因為它導致了王朝制度自身的終結，這是二千年一遇的大事件；同時它也關注是何種力量導致了這一結果，這一力量又是如何成型的。

那麼，終結王朝體制的「各省之力」，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呢？

在此我們提出一種假說，認為「鄉里空間」這一「民間」「自治」空間的形成是實現省之獨立的「各省之力」。根據這一假說，所謂「各省之力」指的是明末時尚在縣的範圍內的「鄉里空間」，迨至清末則擴充

至省的範圍。換言之，「民間」「自治」空間的領域得以擴大，並擴充、形成為以省為單位的代替王朝體制的新體制框架(關於「民間」「自治」將會後述)。

當然，達致省規模之大的政治空間，需要相應的漫長的歷史時間作準備。似可得出一個結論：變化日積月累，直至可成熟地摒棄王朝體制，這至少需要明末清初期以降至清末達二百數十年的時間。

我們在此將立足於這一個假說：孕育於明末清初變動期的某種力量不斷發展、成熟，迨至清代趨於表面化，最後脫穎而出，以嶄新的「民國」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將根據這一假說重新觀察辛亥革命。

(二)清末的地方「自治」

1. 黃宗義與「鄉治」

視明末清初期的變動與清末的動盪為一連續體，並循此上溯時，我們碰到了一個問題：明末清初黃宗義等人中常見的反體制言論，直至清末，卻難覓其蹤。亦即存在著一個貫穿於整個清代的「革命的話語」的空白狀態。這一事實在中國早就被意識到。1906年9月在革命派機關報上刊行政治連載小說〈獅子吼〉的作者陳天華，便藉著小說主人公之一提到：「中國有了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兩百餘年，沒有影響，這是何故？」、「法國自蘆騷(盧梭)之後，還有千百個蘆騷(盧梭)，相繼其後。中國僅有梨洲先生，以後沒有別人了，又怎麼能有影響呢？」(《民報》第7號)指出雖然明末清初的大聖人黃梨洲(宗義)先生的著作《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二篇較盧梭的《民約論》早數十年，但中國在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之後的二百餘年卻毫無產生影響。

的確，若自清初上溯至清末，找尋革命或反體制言論或歐洲型的

「現代」革命現象，便會發現中間二百餘年的空白狀態。因此，如前所述，一般都如是解釋這一現象：二百餘年間反滿、反帝制革命思想如地下之潛流深藏大地，迨至清末方噴薄而出，諸如此類。

問題究竟在哪裡呢？其實，問題正在於以歐洲型市民革命的印象去描述明末清初期的變動和清末的劇變。

但是，讀過黃宗羲的人都承認，本來黃宗羲對王朝制度之當否從來未以置評。因此，從其言論中謀求市民革命之影子，只能令人困惑。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太可能將他視為出現在資本主義萌芽期的人物或資產階級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主張應承認「民」作為社會經濟存在之主體性，主張一地之事應委之予一地之「公論」而已。所謂「一地之事」，將會在下一節討論，主要指以類似善舉為例的地方公益事業，即地方公事。本來地方官的工作大多指「錢穀」（徵稅）與「刑名」（治安與法律事務），除此以外，對於地方官、鄉紳等地方菁英來說，大約在明末之後便開始要應對地方公事。將黃宗羲置於明末的語境中觀察，便會發現，發展「公議」、「公論」，即周全地構築「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這一體制，這正是繼承黃宗羲的想法。以前明末的「公論」和「封建」常常被了無分別地解讀為清末的「地方自治」，亦即與自歐洲東漸的「地方自治」概念相提並論。結果清朝中葉所追求的目標，不知於何時何地便被換為歐洲市民革命色彩的「自治」（即某一領域中被統治者認可的商業、通行等方面的自由的權利，或者是自立於「官」之外的制度性的「民」的體制之「自治」）。人們也試圖從清朝中發現此類的「自治」，在這一「發現」的過程中，原有的「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意義上的「官」、「紳（鄉紳）」、「民」合作的「鄉治」，便被視為不吻合歐洲意義的「自治」而被排除在視野之外了。結果，黃宗羲之後繼者自然也就無處可覓。但是，如下所述，假如我們將明末之「公論」、「封建」不置於「地方自治」的邏輯中，而是將之限

於中國語境本來意義（「鄉治」）的話，便可從整個清代找出成千上百的「鄉治」的後繼者來。

但是「鄉治」這一詞彙卻並非是一般的通用詞，而是借自清末民初著名改革派知識分子梁啟超，因此必須就借用的理由作一說明。這一詞見於其《中國文化史》第7章的「鄉治」。其開篇伊始便有「歐洲國家集市而成，中國國家積鄉而成，故中國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之表述。他自《周禮》、《管子》等古代文獻中旁徵博引，列舉可說明「鄉自治」的文例，他再舉出共同農耕、義務教育、警務、鄉兵操練四項作為鄉治內容，並認為「其精神則在『互助』，其實行則恃『自動（自主自立）』，其在於道德上法律上則一團之人咸互連帶責任，因人類『互相依賴』、『互相友愛』、『互相督責』的本能而充分利用之」⁵。梁啟超認為追求上述內容之完備的社會，正是「鄉治之遺意」。這正是被梁啟超認為相當於傳自西歐的「地方自治」的「鄉治」傳統的涵義。根據這一涵義將時間移至明末清初以降的話，從清代「鄉治」活動的展開中，即善會等勸善性質的地方公益活動、團練（民間自衛組織）、學會等地方公共活動、宗族等互助組織、行會等互助私益活動等活動中，我們便可發現，繼承黃宗羲者其實大有人在。問題在於，不將「民」的「自治」領域處理為自立於「官」之外的歐洲型「自治」模式，而是實事求是地視之為源於「官」、「紳」、「民」協同的道德性自發行為的中國型「鄉治」。

如是觀之，可以以善會實踐為例說明黃宗羲理念的延續。這一善會正是清代鄉治的主角之一。如果這是「地方公事」的實踐的話，黃宗羲所提倡的「地方公事」，以善會為代表，以行會、團練、宗族、學會等活動形式，貫穿、發展於清代二百餘年之中。可以說，迨至清末，它進一步充實，帶來了立憲革命思想磁場的省規模的「鄉里空間」的鄉治。

5 請參見梁啟超（1927）《飲冰室全集》第5冊。

2. 善舉、地方公事、「鄉治」

談及清末「地方自治」，不可不提及明末以降被譽為善舉的善會、善堂（實踐善舉的組織體）的活動。⁶ 善舉如翻譯為日語，則為「善行」、「慈善事業」。清末上海代表性的善堂為同仁輔元堂，它除「實施諸多善行以外，還率先進行道路清掃、街路燈、道路橋樑築造、祠廟之修建、或自警團等實務，『實為地方自治之始』⁷」。除所謂的慈善事業以外，他們從事各個領域的公共事業，「地方自治」這一外來語經日本傳入的當時，人們回顧這一類善會、善堂的鄉治活動內容時，則概被冠之以「地方自治」之名。

關於善會、善堂的活動內容，可參考1908年（光緒34年）《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以下略稱《自治章程》），此章程曾作為「光緒新政」之一環而頒佈制定。這一法案背後，有著其時中國為政者探討立憲體制，亦即地方議會制之「地方自治」的澎湃潮流。實際上，20世紀初義和團事件以後，是存是亡的危機感急速蔓延，主張立憲制的輿論高漲異常。與此相關，傾向「地方自治」的輿論急劇高漲，如「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則近日之風潮也」⁸，又如「所謂地方自治，囂然國中矣」⁹，等所示。而《自治章程》正是出現在這一語境之中。也就是說，《自治章程》可以視為當時體制方的對「地方自治」歷史潮流的證言，同時，也可以從中看出在何為自治對象的問題上體制方可容忍的程度，以及就此所展開的攻防界線。

《自治章程》全9章，共112條細則。我們可以看看第1章「自治範圍」一項所列舉的託付民間的自治行為事務：

- 6 善會、善堂研究的力作，請參見夫馬進（1997）《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同朋社出版；梁其姿（1997）《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聯經出版社。
- 7 《民國上海縣續志》卷二「善堂」，1918年刊。
- 8 攻法人（1903）〈敬告我鄉人〉，《浙江潮》，第2期。
- 9 茗菴（1908）〈地方自治博議〉，《江西》，第2、3期合集。

- 一、學務（中小學堂、幼兒園、教育會、勸學所、宣講所、圖書館、閱報社等）。
- 二、衛生（清掃道路、清除污穢、施醫藥局、醫院醫學堂、公園、戒煙會等）。
- 三、道路工程（道路修理、橋樑建築、溝渠疏通、建築公用房屋、街路燈等）。
- 四、農工商務（牧畜改良養殖及漁業、工藝廠、工業學堂、勸工廠、改良工藝、商業秩序、市場開設、青苗防護、籌辦水利、田地整理等）。
- 五、善舉（扶貧事業、寡婦扶養、育嬰、施衣、放粥、義倉積谷、貧民工藝、救生會、救火會、救荒、義棺義塚、古跡保存等）。
- 六、城鎮的公共運營（電車、電燈、下水道等）。

就公共事務的內容，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其中，第五項的善舉自不待言，第一項至第三項的學務、衛生、道路工程等事務的大部分實施在清代都作為善堂事業（善舉）。我們應回憶起明末「功過格」善行中包含了道路、橋樑修繕等公益活動。也就是說，除第四、六項的農工商務、電車、電燈、下水道等新時代事務以外，整個清代幾乎所有的事務都帶有善舉＝鄉治色彩。在此意義上，《自治章程》既非模仿外國，亦非紙上談兵，而是明末清初以來鄉治的實績。而這一方案融合了傳統「民間」經年積累的自治實績。

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自治經費」這一項。根據《自治章程》，自治經費的財源有三種，一是地方的共有財產，一是「公益捐」，再是違反《自治章程》者的罰金。「公益捐」的「捐」，翻譯為日語則是「據出金」〔日文為「拋出金」〕，本來是對受益於某一公益事業恩澤的住民開徵的費用負擔，就官府的強制性而言這一徵收便是稅金，就住民的自發性繳納而言則是捐款。由是觀之，官民之界線頗富流動性。《自治章程》

所體現的官民之間界線的含糊性，貫通於整個清代善會、善堂的實際運營。或響應官府號召作為捐款捐贈，或作為稅收徵收；或因資金不足而請求官府資助，或因厭惡官府介入而迴避官府資金，不一而足。

總而言之，對他們來說，他們所關心的是一方所需，即如何以一方之手共同且順利地處理所屬地因困難而需幫助的人或事。至於資金的出處是官是民是紳，則不在其關心之列。

上述冠以「自治」之名的傳統善堂、善會的公益事務，具備了跨村越鄉的網絡。反過來說，因中國遺產均分繼承制而導致田土所有關係富流動性，沒有地緣共同體式的村落，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要官府不負責某項公益事業，便只有以民間的網絡方式才能實施：先由民間的某人自發呼籲，然後應者從之，最後形成網絡。以別的話來表述的話，中國的「民」並不接受「官」的制度性保護和管束，因此地方菁英們不得不成為上述學務、衛生、道路、善舉等廣泛領域中的自治之「民」。事實上，根據某類統計，明代末期全國縣的數量有一千三百餘，至清代中期卻幾乎沒有變化。而明末的人口為一億數千萬，而至清末則被推定為四億。可見清末每一縣的人口已達致明末的兩倍以上。儘管如此，非但地方官的人數保持了零增長，而且民間的民間經濟、社會關係還變得更加複雜。因此，「官」的行政服務不得不趨於薄弱。完全可以認為，這些都是善會、善堂等地方公事活動必須加強的背景。

康有為曾以廣東省為例指出，因一縣人口眾多而導致行政人手難及，所以「地方之保衛，不能不民自為謀；學校、道路、橋樑、博施院、醫院，不能不民自為理。於是有仕紳、鄉佬、族正以斷其獄，選人為更練壯勇以衛其鄉，以及堤堰、廟堂、學校、道路、橋樑、公所、祭祀一切，不能不民自為理。」（〈公民自治篇〉）康有為所言，想必正是鄉治的問題。

「自治範圍」所列舉的上述公益事業，若上溯歷史，明顯可見的是，在當時人們的認識中大半的公共事務乃包含官、紳、民共同進行的「善舉」在內的「鄉治」，亦即近人所謂的「地方自治」。

今人因無意識中依據「現代」這一框架，所以談起「地方自治」，便會問如何「民間」自治，如何實現法制化；談起「民間」，則會問如何自立於「官」、「體制」之外；談起「自治」，則會問如何將之作為國家體制中的明文化制度，或會問實行者的市民權利如何被保障，等等。但是，實際上，歐洲的地方自治的主要內容涉及中世紀都市中擁有特權的市民的移動自由和商業自由，是權利的自治。與之相比，中國地方自治的鄉治的歷史語境本來便迥然有異。

在中國，至少清末的被概念化的「地方自治」=鄉治的內容，一方面基本上是傳統的「互助」「勸善」的道德實踐，另一方面則是「官、紳、民」共襄為之的地方公益事務實踐。當然，所謂的道德實踐，比如視所有的捐款予善會、善堂的行為為捐款者的道德獻身，這並不完全如此。有些捐款的動機其實是立身出世或造福子孫。其動機多種多樣。但是，若上溯至明末清初道德色彩濃郁的善會，會發現上述行為無疑是循此源流發展過來的。

由明末而清末，這一「善舉」繼承了「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這一基本原則。並且，它由明末個人或團體的手工製作時代而發展至清末組織化、網絡化時代。就「善舉」內容而言，明末對窮人的救濟、保護、養育等所謂的慈善事業占其大半，而發展至清末，則廣及土木事業、教育事業、民生事業、衛生事業等。如果說這便是自治的話，中國的自治是與歐洲的「權利的自治」相對的，或許可以稱之為「以公益為目的的自治」。

以上，我們論證了「鄉治」具有如下性質：中國清代的「封建=鄉治」模式，貫穿於整個清代，是「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意義上的

地方自治；此時，財政是否自立於體制之外並非關鍵。即使是「民間」主導，其內面實質上更多也是官、紳、民共同運營；在明末清初，這一類善會活動作為地方菁英的個人性勸善活動，其所及範圍也大致限於一縣之內，至清末其運營則被組織化，其聯合則常廣及全省。總之，傳統中國的地方自治與歐洲的語境迥然有異（並非於權利層面而是於道德層面），它完全作為善舉（指道德行為，亦即梁啟超所說的「互助」）的公益活動。這是我們稱之為「鄉治」的理由。鄉治的各種各樣的實踐正是我們所說的「各省之力」的構成體。

此外，附帶指出的是，省整體層面的聯合中「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這一社會原理，後來發展至諸如湖南省獨立運動中「湘人治湘」這一政治原理。

3. 清末「自治」力量

辛亥革命採取了各省獨立這一革命形態，各省宣佈獨立，意示著各省已經判斷過自己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具備能夠獨立的力量（各省之力）。這一力量在數字上進行判定本不可能，但是軍隊脫離中央權力站在省的一邊，這無疑是決定性的要因。省的軍隊，循其源流本是為補充中央軍而成立的地方軍。太平天國時期所成立的湘軍、淮軍即屬此類。

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叛軍席捲各省。而原來相當於地方駐軍的綠營軍本來便是從遠隔之地招募來的軍隊，因此與該地方無任何利害關係，也不可以往駐紮地以外的地方派軍，以作為軍事上的約束。因此，太平天國軍將各縣各省的貧民捲入其中，輕而易舉地突破了各縣各省的防線。深知綠營軍局限性的清廷，旋即將湖南省的防務委託予湖南省出身的朝廷大員曾國藩（1811-1872），作為「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軍事版，他建立了由湖南人自組的湖南防衛軍亦即湘軍。雖

然此後經由李鴻章（1823-1901）所建的淮軍，幾經曲折結果最後演變成軍閥，但當時鄉人自組的鄉里防衛軍卻是士氣高漲，而且更借助鄉紳等實力階層的捐款和地方財政撥款，獲得了新式洋裝備，在鎮壓太平天國軍方面充分發揮了威力。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湘軍最強之處，在於其本於鄉土之愛，以自己的力量守鄉護土。從鄉里一方看來，以前的叛亂是外鄉人的王朝軍與叛軍之間的對抗，而這次卻是吾鄉之人守吾鄉之土的新軍，與王朝軍對叛軍這一構圖有所不同。在漫長的民眾叛亂史中，鄉里武裝的出現大概也是史無先例的。它也許應該作為清末的歷史推進力而予以評價。

湘軍這一歷史的新勢力可以上溯至湘勇（團練出身的鄉勇）。對湘軍的活躍，清末革命派汪兆銘（精衛，1833-1944）後來回憶往事時曾指出，當時軍費籌備權被委之予一省甚為總督巡撫層級，而且用兵也遠離中央兵部的控制，變得可以穿越省境，自由出兵，因此，汪兆銘評價說，軍政財政兩大權由中央往地方移動，這正是相對於中央集權的「地方自治」的實踐。¹⁰

在清朝頒布9年後轉向立憲制的勅諭（1906年9月）後的翌月，汪兆銘在《民報》上主張，應在仿效日本明治體制的皇帝本位立憲體制尚未完善之前，「急謀自治，收權於地方團體」。這裡所說的「地方團體」指的是善會、行會、保甲（民間員警）、團練（民間自衛組織）、學會等民間組織，這些正是「鄉里空間」的經濟社會力量蓄積之所。「急謀自治」之「自治」明顯有著「自立」之意，言論上自治最後亦轉向自立而最後趨向獨立。這是清末不可逆轉之大勢。雖然湘軍成立的目的是在於鄉人鄉防，且因其地方性而救清廷於危機之中，但以後也因同樣性質而成為導向清朝瓦解的「鄉治」，成為地方自立與獨立的出發點。但是，

¹⁰ 請參見1906年《民報》8號。

湘軍本來便依靠本地團練組織成立，從這一經過來看，它無非是地方（省）自己的軍隊。也就是說，它表明在湘軍建軍計畫出現之前，令湘軍建軍得以實現的「鄉里空間」的力量，在省這一層面中早已蓄積已久。康有為下面的發言可視為旁證。

康有為指出，太平天國以後，在康出身地的廣東省，原本由仕紳組織團練自衛其鄉，但假如一鄉之力偏弱，便會聯合數鄉、甚至數十鄉，其中更有幾乎遍布全省之聯合。據他記述，其故鄉南海縣有被稱為同人局的團練局，之下擁有36鄉、男女約五萬人，更大的局則有三十餘萬人之眾，小則擁數千人。廣東全省遍設團練，有大事局紳共同協議，大的局則制定章程。康言之為「純乎地方自治之制矣」（《公民自治篇》）。此處所指，是借太平天國出現為契機而強化地方團練，但這也表明太平天國以前各縣團練組織已經作為自衛的潛在力量蓄積已久。如記錄顯示，廣東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便以團練之力與英法聯軍作戰。

康有為指出，他出生前一年的1857年，廣東的廣州府被英法聯軍攻擊，之後至1861年為止的3年間處於聯軍的占領之下。其時（1857至1858年），廣州灣沿岸以南海縣為首的廣州府下14縣鄉紳與中央欽派的新任總督一起，自行籌備軍用資金及武器、彈藥，並於花縣開設廣東團練總局。據說他們將聯軍誘敵於城外作戰，取得了勝利，以後聯軍無法出城。¹¹此一類以與外國軍隊作戰為契機而引發的諸縣團練聯合之例似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無論如何定位，這一例子表明，如果需要超出縣範圍的省內聯合（後來與各省獨立相連的鐵道國有化問題即屬此例），使之成為可能的潛在網絡在省內各地早已充分形成。

比如，在這一防衛戰中發揮了中心作用的順德縣團練局，它作為

11 請參見當時南海縣知事華廷傑的《觸藩始末》全三卷。引自西川喜久子（1988）〈順德團練總局的成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一百五冊。

附設機關具有仕紳雲集的社交團體（大良公局），還有科舉應試援助者以及後來成為議政中心的文化團體（青雲文社）和沙田的管理機關（東海護沙局）等。他們聯合起來，從事各種各樣的地方公事，例如城牆和火藥庫的修補、新炮台的設定、水路的浚濬、石路的鋪設、義倉的設置、河流的管理等，其聯合甚至廣及包含軍事在內的公共事業。

順德團練局這一非常普通的個案，表明當地的官、紳、民能夠循省內錯綜的網絡而聯合起來，以應對並左右各種各樣的事態。

在此，所謂的「省」，指的就是貫穿於鄉、鎮、縣、府的網絡，這一網絡以同心圓或放射線狀在同一平面上縱橫流動，這正是一省之「鄉里空間」，亦即鄉鄉聯合的政治社會空間。在這一空間裡有行會的網絡、善會善堂的網絡、或清末林林總總的學會網絡等，還有縱橫穿梭於省內的網絡之間的聯合。這一網絡組織團練，是軍隊化的基礎力量。

我們知道，以太平天國為契機組建了湘軍、淮軍以後，地方軍權事實上已經委託予省督撫（總督、巡撫），督撫的行政權力也已飛躍性地得到強化。因為存在著複雜的網絡流動，並且這一流動由點及線、再由線而面地往鄉、鎮、縣擴散，省軍的組建才得以實現。重要的是，網絡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生命力，它處於頻繁的活動狀態。可想而知，假若匯聚於上面提及的青雲文社的青年們出版宣傳革命的雜誌的話，雜誌便可循網絡而傳往省內其他地方。作者通過網絡出現，讀者因同樣的網絡而擴大。這類網絡空間以都市和市鎮為資訊發出地或中轉站，官、紳、民互相連接。這一動態也正是「鄉里空間」的動態，也正是汪精衛所說的「地方自治」空間。

4. 邁向省的獨立

辛亥革命以省的獨立的形式得以實現，其要因多種多樣。

首先，借助太平天國起義的契機，湘軍、淮軍得以組建，地方軍權因此被委予省督撫（總督、巡撫）；洋務派官僚振興工商業及與此相關的仕紳層興起，因設置諮議局而帶來的省級行政機構的成立，廢止科舉而導致的西學流入，立憲、革命思想也因此盛行，等等這些可能都是革命的原因。但是，假如沒有省級的「鄉里空間」，上述這些事實中的任何一個可能都無法實現。至少可以說，若缺少這一「鄉里空間」的擴大，革命派和立憲派的活動也不可能有基礎。

變革或推翻清王朝的言論在清末充斥於國內外。主張立憲君主制者有之，力主滅滿興漢的民族革命者有之，提倡推翻王朝的共和革命者有之，謀求省之獨立者有之，各種言論可謂林林總總。但是結果卻是各省獨立的形態帶來了帝制的瓦解。

清末紛紛刊行的宣傳新思想的雜誌，如《浙江潮》、《江蘇》、《新湖南》、《新廣東》、《湖北學生界》、《雲南雜誌》、《四川》、《河南》、《江西》等，多冠以省名。這表明其時省的文化、經濟、社會的網絡空間已經形成。

辛亥革命以鐵道國有化為契機得以勃興，這一經過也是極富象徵性的。它發端於清政府1911年5月將民營的川漢線（成都—漢口）與粵漢線（廣州—漢口）收歸國有，沿線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各省的鐵道公司被強制性接收。政府的意圖是通過國有化將鐵道作為向外貸款的抵押，因此朝廷（中央政府）欲主導鐵道的鋪設。各省本來主張自立更生鋪設鐵道，因此，維護地方權益的各省仕紳在此問題上與朝廷針鋒相對。結果，同年10月武昌軍隊起義，11月下旬24省中14省脫離清朝獨立，而至翌年1月清朝命數已定。事後觀之，鐵道正是一個集中了各省之力，並連接了各省之力的實業。在民間承辦這一實業的省的仕紳力量其時已經足與中央權力抗衡。因此，曾經是各省立憲派的仕紳們也蜂擁般邁向獨立，與革命派合流。「鄉里空間」在鋪設鐵道

問題上已經達致臨界點了。

從成熟的「鄉里空間」這一角度去觀察辛亥革命時期的省的獨立時，其中顯然可見的是，「鄉里空間」因為只止於省的層面，因而缺乏新的國家構想去代替王朝。

辛亥革命的歷史特質之一，如反覆指出的那樣，在於其採取了各省獨立這一形態。所謂「獨立」，換言之，便是省的權力自清朝統治體制中脫離出來，由此導致中央集權的王朝統治體制的瓦解。為了填補這一瓦解後的空白，各種各樣的國家構想便在革命後的中國大陸上交錯出現。

其中也有類似袁世凱恢復帝政的構想，以及張勳重構清朝的復辟計畫等，而這些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對時代的誤判。

一方面，既有鑑於湖南共和國運動中的省共和國的建設構想¹²（其將來的計畫是各省聯合），也有省共和國聯合體的聯邦國家構想（20年代風行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有中央集權的國民革命構想。後者後來成為主流。後來還有與內戰相隨的抗爭，更有乘機而入的歐美列強和日本的侵略。

從明末清初縣規模的「鄉里空間」，至清末省規模的「鄉里空間」的成熟及其結果的省的獨立，從這一歷史推移來看，聯邦共和國構想似乎是最現實的構想。但是，因擔憂各省軍隊的軍閥割據化，以及擔憂軍閥與外國勢力勾結一氣進行割據統治，樂觀的聯邦構想——沒有中央的或者弱化中央的聯邦構想——因之沒有實現。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裡西歐和日本所出現的國家觀念本來便稀薄，朝廷＝王朝便是國家，民並不隸屬國家，因而在傳統上形成了一種天下觀念，作為天之子民而歸屬天下。民容易接受「天民」這一說

12 請參見塚本元(1994)《中國國家建設的嘗試：湖南1919-1921年》(中国における国家建設の試み)，東京大學出版會。

法，卻難於習慣「國民」這一說法。康有為使用「公民」這一用法的背景也與此不無關係。

結果，西歐列強及新興日本的殖民地干涉和軍事侵略，國際環境趨於嚴峻，人們選擇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建設這一道路。「天民」變為「國民」，建立「民族國家」，這是辛亥革命以後自1910年代至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苦難歷程。在這一過程中，1910年代以降，以雜誌《新青年》為代表，全國規模的學會、商工會、工會等組織活躍於政治舞台，它們跨越了省的範圍。

這些史實為大家所熟知。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歷程是如此充滿苦難，其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革命話語，這些多有詳論，在此不贅。

| 回應 |

歷史視角的選擇

楊貞德

各位來賓，大家好。非常謝謝主辦單位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討論溝口先生關於辛亥革命的看法。我一方面覺得很榮幸，另一方面卻也覺得不安。之所以覺得不安，主要由於我不懂日文，沒有辦法直接閱讀溝口先生的著作；另外，我在史學方法上和溝口先生的立場和背景也很不相同。所以，在考慮如何提問的時候總是覺得猶豫，不知道怎麼說比較恰當、比較能夠提出真正可以進行對話的問題，真正增進對於溝口先生所提出歷史解釋的理解。這不是客氣話，等一下也許大家就看得出來。我在討論的時候試圖把問題極端化，極端化的意思是說，溝口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種種不同的線索，我在一個程度上把部分的線索對立起來，對立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因此比較清楚地看出溝口先生面對歷史的立場，比較清楚地理解他關於辛亥革命的解釋。只是，這種作法很可能無法顧及先生在文中談及的諸多細節，也無法顧及先生所提出看法的針對性（也就是先生的說法其實是針對某些特定歷史解釋的反思）。這是在這裡應該先要說明的。

接下來首先要提出來討論的議題是：溝口先生的視角及其歷史性。剛剛主持人王汎森先生已經提到了，溝口先生對於近代中國史研究中的鴉片戰爭和現代化視角都有所批評。這些對於既有視角的批

評，能讓我們比較有意識地省思我們目前的歷史知識，而且因為其中涉及問題的複雜，往往讓人讀來興趣盎然。（這些問題包括：要如何看待並找出不同階段的歷史的特徵？如何劃分歷史的階段？歷史現象究竟是單元或多元？要重視歷史的延續還是斷裂？要強調歷史中的共相還是殊相？如何進行比較研究？如何利用特定時空中不曾發生的事件，來分析該時代或該地區的歷史？以及如何找出「世界的歷史」等等問題皆是。）其間，溝口先生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他雖然反對把近代西歐帶進來作為觀察中國歷史的依據，事實上卻又似乎援用了類似的方式。當然，從每個史家都有他的歷史性、都受他所在的時空條件和他自己的關懷所影響這一角度來看，溝口先生的提法自然有他的正當性。只是，藉由討論這個有意思的現象，或許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看出溝口先生所提出歷史解釋的性質和意含，以及更深入考慮比較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我因此也就先從方法論的部分，提出兩個問題來就教於溝口先生。第一個問題是：溝口先生很清楚的意識到、而且強調：歷史可以從不同的視角觀察。這點我十分同意。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溝口先生在強調不同視角的時候，並且講「歷史(本來)的全貌」、「歷史全景的高度」、「歷史的內在動力」、或「歷史深層的流向」。我每讀到這些地方就十分好奇：「歷史的全貌」……等等名詞這時候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先生希望以「歷史的全貌」這樣的說法來表達什麼樣的立場？什麼樣的視角可以讓我們把握「歷史的全貌」？這一個問題之所以有意思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具有操作(也就是如何進行史學研究)上的意含。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因此會影響到我們實際解釋歷史的方向和方式。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存在並且試圖追求真正「歷史的全貌」，那麼如何界定和找出「歷史的全貌」？如何看待那些曾經發生、但無法納入所謂「歷史的全貌」中的事件？這些都會成為重要的問題。這種強

調歷史全貌的作法，固然有它的限制，但是在凸顯歷史現象中的特定面相上，也可能有大的貢獻。馬克思主義和其他認為人類歷史(或者是特定地區特定時段中的歷史)具有基本結構或特定目的的看法，或許都可以算是這一類型的討論。另外，如果我們認為實際上不可能見到整個的歷史，而只能以更多的視角，豐富人們對於歷史的理解，這時候問題就會變為：如何評價不同的視角？如何判斷那一個視角得見所謂「歷史的全貌」？是否涵蓋時間較長的解釋，所看出的就比較屬於「歷史的全貌」？綜合來說，如果「歷史的全貌」一說具有這兩種(或者其他更多)不同的意義，梳理溝口先生在引用這些名詞時所指稱的意義，很可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先生關於近代中國史的解釋——特別是如何界定「近代」的意義和起點——以及這一解釋和其他的歷史敘述或分析之間的不同。

我的第二個問題來自於溝口先生所強調的，從中國的脈絡看問題這一主張。先生之所以這麼主張，也許是為了凸顯出追求客觀歷史的重要性。不過，緊接著而來的問題是：當我們要從中國歷史本身的脈絡來理解近代中國時，實際上要怎麼進行？怎麼從各種史料中選擇和組織？溝口先生告訴我們：他從結構的層面來看、來談相關的問題。確實，當我們觀察一個歷史現象時，我們可以說自己的著眼點是結構或者是變化，是連續性或者是斷裂，是共相或者是殊相。可是，在這些結構或變化、連續或斷裂、共相或殊相，以及其他等等可能性中所做出選擇的背後，我們其實有個為什麼這麼選擇的考量。從這個層面看，溝口先生選擇從結構來談歷史的原因是什麼？先生反對用近代西歐當作標準來看待近代中國。那麼，先生在主張從中國歷史的脈絡看問題時，到底是用什麼標準看待中國歷史中諸多的事件？用什麼標準決定近代中國的起點和特徵？

更具體地說，我本來打算向先生請教的問題是：在1911年和1949

年這兩個近代中國史上關鍵性的革命時刻中，為什麼選擇以1911年辛亥革命作為重點，而不是選擇1949年的中共建國？這兩個年分不論選那一個，都可能說是本於中國傳統社會內在的情況、內在的結構。（1949年如果連繫上中國歷史中所謂分久必合的傾向，似乎也可以說是內在於中國傳統、出於中國內在動力的抉擇。）其間，溝口先生選擇了1911年。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由於辛亥革命中王朝體制崩潰了？如果是這麼考慮，我們似乎也可以問：辛亥革命中王朝體制崩潰的現象，連繫上的為什麼不是晚清革命的理念，而是明末清初的封建主張？封建理念過去終究不曾導致王朝體制的崩潰！當然，從先生剛剛的說明中我們知道，先生希望在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之間建立起一個有機的結構。可是，在明末清初的種種事件之中，先生又為什麼選擇以黃宗羲為起點？先生在談黃宗羲的時候，特別指出黃宗羲的看法在當時只是思想理念、實際上還沒能實踐。那麼，為什麼從黃宗羲——從一個尚未真正付諸實現的理念——說起呢？先生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考慮下，選擇了這一視角？

剛剛會議主辦人陳光興先生和我說起，溝口先生看待近代中國史的視角和他對於日本的關懷有密切的關係。這雖然並不代表先生的視角必然是直接根據他對於日本的理解而來，卻也指出一種可能性：也許先生的視角並不只是從近代中國歷史本身來看就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我的問題在這裡也就轉成為：先生為什麼會決定以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這一組關係來講近代中國史的特徵？或者說：先生為什麼選擇從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來看近代中國史？先生的選擇用來看待中國史的視角，是不是根據中國歷史上所謂「集權—分權—集權」的循環模式來決定？如果是這層考慮，那為什麼不用象徵集權的1949年為標誌？如果先生是以中、日比較的視野為基礎，這種視角的選擇涉及外在於中國的歷史現象。它和以近代歐洲的變化為視角的選擇之間有什麼

麼不同，對於我們思考如何進行比較研究又有什麼值得重視的意義？

我的第二部分的討論主要是從溝口先生關於辛亥革命的解釋說起。先生的說法有豐富的內容和意義。我在這兒先說一下自己從中得來的一些想法。首先，先生從王朝體制崩潰、從地方分權的角度強調辛亥革命的意義，提醒大家注意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我們讀書的時候都讀到辛亥革命是由各省獨立而成，太平天國之後清朝的權力下移，以及其他等等溝口先生提到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怎麼把這些事件有系統地串連起來，往前往後拉成綿延三、四百年的脈絡？這就不是光只是知道曾經發生這些事件，就能夠提出來的。另外，溝口先生的討論中不僅有個主要的歷史解釋，也可以看到一些未曾仔細分析、但值得進一步思索的議題。例如，在中國建立聯邦制的可能性及其阻礙，就是這樣的一個議題。我在讀先生著作的時候心裡不免有個疑問：先生是不是希望中國能夠建立聯邦制？他對於中國最後走向中央集權，似乎帶著若有憾焉的感慨，並且特別指出一些使得民國時期聯邦制不能成功的原因。這個時候，無論我們是不是同意先生的分析，都可以從他的討論試著往前看，看看從歷史上觀察，中國到底有沒有建立聯邦制的思想或者是制度上的資源。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普遍王權」在中國歷史上到底處於什麼樣的地位？「普遍王權」一般是說：中國傳統以來有個天下統於一的看法；統於一的意思不僅指的是政治和道德這些不同方面的領袖都是同一個權威、或者來自同一個根源，而且也認為在空間上全中國有個一統的政治或道德權威。由於「普遍王權」理念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有些（甚至是很多人）可能會因此主張：在「普遍王權」理念和現實的籠罩下，中國很難發展出真正分權或者聯邦的作法，或者至少需要先克服這一個阻礙。從這樣的立場看，似乎集權（而不是分權的傾向）才是中國歷史本來的走向。

相較於這種看法，溝口先生顯然提出了不僅不同、而且相對立的歷史解釋。那麼，在或者從普遍王權、或者從地方分權看待中國歷史的脈絡這兩者之間，我們究竟要怎麼衡量和選擇？這是另一個從溝口先生的看法中帶出來、並且可以再加考慮的議題。

最後，我想和大家一起就教於溝口先生的，是歷史中的共相和殊相的問題。先生在討論歷史的時候（或者說在討論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之間這段歷史的時候），顯得注意其中的共相多於殊相，注意共同的地方多於差異的地方。這個部分當然先生有他的考量。只是，先生為什麼特別注意共相多於殊相呢？當然，溝口先生其實也談到殊相。（比如說：先生剛剛提到，從清朝以鄉為單位的自治，到了民初已經擴張到要求以省為單位的自治。先生在書中另外談到更多其他的例子，並且曾經表示「歷史看上去似乎是在不斷重複，但實際上是發生了很大的質變」。）只是，先生在連繫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歷史過程時，強調的還是其間地方分權和其他等等歷史事件中的共相。這時，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些歷史事件中的殊相呢？

我們在閱讀溝口先生的著作時可以留意，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階段，這些先生所列為共相的事件，彼此間其實有不少的差異和變化，而且這些差異和變化也各有它們的重要性。舉例來說，我們看見地方上從支持中央（或者至少不反對中央）到要求地方分權的出現；傳統的善舉原先是為了維持地方的秩序或福祉，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就很明顯的是要和中央分權。其他的例子還有：從黃宗羲認同封建到汪精衛主張地方自治之間的轉變；從鄉紳所代表的民間勢力到要求以國民身分參政之間的變化；從君主制度到反王朝體制的變化；從善舉著重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福利，到地方自治主張中抽象權利理念的出現；從禮教的治理到禮教式微的變化；反對軍閥和反對地方分權之間的差別；地方上意定(intended)並且公認具有正當性的治理方式(如善

舉)，以及非意定並且正當性受到質疑的治理方式(如軍閥割據)之間的差別，以及其他等等。這些差異和變化就理解近代中國來說，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不過，它們在溝口先生的討論中或者不曾出現、或者處在比較微弱的地位。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注意的主要是這些現象或思想中得以列為歷史共相的內涵，則這些看來相似、實質上不盡相同的差異、變化，及其歷史意義很可能就會被消解掉了。

我因此而有的問題是：為什麼溝口先生決定特別強調這段歷史中的共相？這些共相之間的關係，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如果說我們的目的是豐富歷史的知識，則強調其中的殊相，是不是可能更有幫助呢？比如，溝口先生指出：晚清地方自治實際上是將中國傳統的善舉法規化了，新的法規納入的是舊的善舉的內容。這個說法本身相當有意思。但如果我們跨出這個共相去想，則先生的說法同時也指出一個有趣、但文中並未說明的現象，也就是：溝口先生所強調的「各省力量」的形成和組織化，實際上蘊含了「近代國家」逐漸成形和政治力量(相對於社會力量)的逐漸擴充。先前的鄉治可能是由鄉紳根據事實的需要，根據禮教的規範而定，而不是政府的積極作為，但到了清末，這些鄉治的作法卻成為政府立法規範的對象；雖然法規這時只是合法化現有禮教的要求，但是法律的地位因此升高，法制化的作法以後並且成為改變現狀、改變禮教的工具。這個禮和法之間的變化在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論述兩方面，可能都有它值得重視的意義。換句話說，溝口先生所討論的事件之間，有很多細節顯示出近代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中（或者說在這三、四百年來）諸多有意思的變化。它們在強調歷史事件之間的共相這種作法(或過程)裡，很容易會被掩蓋住。那麼，在決定要著重歷史的共相或是殊相(或者歷史的延續或斷裂)時，先生考慮的基礎究竟是什麼？

這個共相與殊相的選擇之所以重要的另一原因，在於它可能影響

我們對於歷史動力到底是什麼的解釋：是造成共相的力量？還是造成殊相的力量？把這個問題放在近代中國史的脈絡來講，強調歷史事件中的殊相會特別涉及到，如何看待鴉片戰爭以來的變化和外力衝擊的歷史角色。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比較屬於歷史全貌(涵蓋面較多)的描述，則怎麼在關於近代中國的歷史解釋中確切說明這些外來衝擊的性質及其影響——特別是它們怎麼造成了歷史上的質變——可能就是個值得再加考慮的問題。(到這裡，我們似乎回到了最開始所提出的，「歷史的全貌」的意義和歷史視角的選擇這些問題上了！)

我的討論就到這兒為止，說得有些兒混亂，實在抱歉。閱讀溝口先生對我個人來說收穫很大，因為讓我注意到原來不曾注意的現象，或者想起一些原來不曾想到的問題。不過，由於不熟悉日文的論述方式，我在試圖把握溝口先生的討論時，其實也覺得相當的辛苦。這些辛苦當然是值得的，只是希望其間不至於誤解了先生的意思。

| 回應 |

勉力獻疑

賀照田

一拿到溝口先生此次演講的參考資料〈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 (林少陽譯)，便強烈感覺到自己當初答應來擔任溝口先生今天演講「從辛亥革命看中國近代」的講座與談人是多麼輕率。當初答應是因為我自己在開中國近代思想的課，課中包括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同治中興所以失敗、甲午戰爭清朝所以失敗這樣一些課題，以為也許可以從我自己的方式和視角為講座貢獻些觀察和問題，但當我讀到〈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後，發現溝口先生在其中所涉內容之廣泛實超出我平時之積累，所提問題之重要和獨到，雖啟我深思，但參與討論則為我能力所不及。心情、感受如此，卻勉強坐在討論人位置，惶恐之情可想而知。

比如，在本演講中具關鍵支撐作用的「鄉里空間」概念，據我所知，便既是他自己長期思考研究的結果，又是他對日本中國研究界大量明清經濟史、社會史、法制史、制度史、思想史成果進行長期消化和對話，並在消化和對話過程中不斷對這些成果加以轉化和點化的結果。而不論是對使溝口先生今天演講內容得以形成的研究、思考過程，還是其思考所關涉的大量日本中國學界的研究成果，我的瞭解都

* 編註：〈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一文為溝口教授來台講座提供本場回應人之論文草稿，講座結束後已定稿為〈辛亥革命新論〉一文收錄在本書。

是非常不夠的，這就使得我今天沒有條件像我平時做回應人那樣，深入到對方論文細部做專業討論。

而且，我以為，溝口先生的研究表面上只涉及中國和日本，但在根本處卻是在處理一個具世界性意義的課題，就是：溝口先生所以在研究思考中國、思考評論日本時具有某些特別的視點和品質，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在試圖尋找一條可靠而有效的路徑來思考，如何在既面對由歐洲和北美所啟動的現代性浪潮所帶來的種種具體問題，又歡迎和不迴避此現代性浪潮所帶來的種種自我充實、自我解放的契機的同時，有力地來面對自我問題，處理自我問題。

要不斷成功、及時地回應由西歐、北美啟動的現代性浪潮所帶來的種種具體課題，要求被捲入者不能簡單地自我固執，而必須具有開放性和敏銳的面對世界的反應力；而要不錯過此發端於西歐、北美的現代性浪潮中所蘊含的種種自我充實、自我解放的契機，則要求我們不僅不能簡單的自我固執，而且要在思想、文化、社會、制度、認知諸方面均內蘊自我否定契機和機制。這兩個前提決定了溝口先生在思考自我問題時和簡單自我固執者的決定性差別。但由於現代中日知識主潮，多為以要建設性和成功地回應現代性挑戰，就不能過分自我固執和需要自我否定的正確理由下，過分以西方價值和視點來定性、判準本土問題，這就使得溝口先生在討論相關問題時，多以過分以西方價值和視點定性、判準中國與日本現代的思潮為駁詰對象，而這也使得許多讀者，不注意溝口先生和簡單自我固執者、簡單自我肯定者的不同同樣是根本的，或者說是更為前提的。

溝口先生這樣一種在簡單自我固執和實際上缺少真正自我維度兩極所形成的張力場中，對如何更好、更準確地思考自我問題的摸索，常讓我想起百年以前的思想家章太炎，想起他的〈社會通詮商兌〉、《齊物論釋》著作，想起他在100年前中國知識界或簡單自我固執或被西

方現代思潮搖撼到連根拔起時對「自性」問題的思考。通過「以不齊為齊」、「萬物各適其性」這樣一些哲學層次的思考，章太炎操《齊物》以解紛，既超越了其時很多知識人士缺少內含自我否定的自我認識層次便自我固執的思想局面，又尖銳針砭了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輕易被以普遍性面目出現的西方思潮席捲而去的時代思想局面。

當然，相比章太炎，溝口先生的重要性決不僅僅在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注了同樣的問題，而在於章太炎型的觀念、價值層面對自性問題的思考要在具體的「歷史—現實」脈絡中落實為深刻的認知成就與行動意識，必須要在具體的「歷史—現實」脈絡中找到一客觀有效的認知路徑全面展開此問題。也即章太炎的思考雖然在哲學、一般理論的層次確立了正確的觀念意識，但卻遠遠不能代替在具體的歷史—現實條件下所給出的準確歷史—現實分析所具有的認知幫助意義和行動指導意義。事實也的確如此，顯然，溝口先生工作的重要性不在高度觀念性地重新提出此問題，而是在中日具體的歷史境遇中對此問題富於成效的探索，並在其富於成效的探索中所提出的各種與具體工作緊密關連的知識思想反思、認識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

我自己首先是在這一意識方向上閱讀演講提供的閱讀材料，聽溝口先生剛才演講的。只是，我雖然高度關切這一重大問題，卻缺少討論這一問題應該有的視野和能力。此一不足，和前面講的對支撐溝口先生今天演講的歷史視野和相關研究積累的不足，使得我今天的回應只能是為完成任務的勉力為之。高不能到具根本意義的論題層面，低不能進入專業細部討論。高不成低不就的結果只能是：借用溝口先生本演講、本演講閱讀材料提供的史實和論述，與一些人皆知的史實來勉強發問。希望這些發問有助於推動溝口先生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釐清、深化在本演講中具關鍵位置的「鄉里空間」、「省力」〔省の力〕等新創概念。

我的問題有關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有關「鄉里空間」的。溝口先生在〈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的末尾部分寫到中國獨特的「封建」概念成立之過程，他檢討到：

對1920至30年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按歐洲歷史構築的將發展階段的歷史區分作為世界史予以普遍化的人們——來說，如前述所示，其障礙在於，不僅中國歷史中不存在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制，而且在歐洲作為古代表象的帝國統治體制在中國也以現在時延續著，亦即是所謂的「中國特殊性」。結果，他們構築了長達周秦以來三千年的王朝與地主的封建統治這一假說，將占國民大多數的農民從半封建狀態中解放出來，建立人民民主的民族國家，便成為他們的革命目標。

本來歐洲「封建」這一歷史概念是以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制為內容，它有作為政治、社會制度側面，和附於世襲制身分制度之上的上下秩序統治，以及領主、貴族(地主)對農民的所謂經濟上外在的強制統治的側面。

在中國，他們簡單認為古代曾有過作為政治社會制度的封建制，但因為秦漢帝國以降是以中央集權制為原則，特別是宋代以後科舉官僚制進一步完善，中央集權制也得以確立，所以，他們只好將政治、社會的層面剷除在外，而將見於宗族制的上下秩序及地主對農民的強性支配的一面作為中國的封建內容，此類觀點直至現代。但是，以歐洲歷史概念為基準的這一封建觀，在考察宗族制、地主、農民的樣態時，卻帶來了意識形態先於事實的弊端。

我完全同意溝口先生這段扼要又精彩的敘述與評論。我的問題是，大家知道此一相當程度非歷史的敘述和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那部分

中國革命的高度關連性，但由此便也生發出，為什麼一個相當程度非歷史的敘述所對應的歷史行動過程卻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成果；相比，國民黨主導的建國運動和社會運動實際上是更重視仕紳網絡的，卻在與共產黨的競爭處於不利地位。這樣的歷史現象，會讓我們想到，如果我們只強調鄉里空間「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鄉自治這一面，只強調仕紳網絡存在對鄉里空間的社會歷史意義，我們會在解釋上述現象上碰到困難。所以，沒有「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的鄉自治這一面，溝口先生所命名的「鄉里空間」應該不會出現，但此成立後的「鄉里空間」中應該還蘊有其他重要方面，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這些不同的方面應該有不同的發展，並導致各方面產生不同的組合關係。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看起來更順應「鄉里空間」仕紳網絡存在的國民黨實踐反不如看起來非歷史的共產黨的實踐在現實中有效。

我其次一組問題是有關「省力」(日文為「省の力」)的。溝口先生本演講的中心提問是為什麼辛亥革命是以各省獨立這樣一種面貌出現的，並且在革命後相當程度上是以省為單位呈現為一種四分五裂的狀況。對此，溝口先生的回答是，16、17世紀明末清初「地方公論」的「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之意識配合之後的社會、人口、制度、經濟等條件在清代落實為「鄉里空間」，此歷史趨勢經兩百餘年之發展，加上清晚期社會叛亂等契機，至清末已擴充為省範圍的「省力」，而正是此「省力」的存在導致辛亥革命是以各省獨立為呈現面貌的，也使得接下來的四分五裂狀況相當程度是以省為活動和想像、規劃單位的。

顯然，溝口先生的「省力」提法是有高度歷史說服力和解釋力的，因此我的問題不是質疑此一提法能否成立，而是如何進一步界定此概念的準確歷史內涵。

這方面我第一個問題是，我想套用溝口先生「省力」的提法臨時造一個「國力」的提法。因為正如溝口先生在閱讀材料〈激烈動盪的清末

民初〉中所指出的，1910年以後，一方面經常是政治、武力的分裂，一方面卻是跨越省範圍的各種全國規模的學會、商會、工會等的廣泛存在，梁漱溟也多次指出此點，一方面是南北政府等的分裂、許多省的實際獨立，另一方面卻是政治、武力之外的各種全國會議的順利召開。可見，在清末民初一方面有溝口先生所指出的省力之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妨暫時名之為「國力」的這種東西的存在。要不，就會產生溝口先生在〈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所給出的問題，「從明末清初期縣規模的『鄉里空間』，至清末省規模的『鄉里空間』的成熟以及其結果的省的獨立，從這一歷史推移來看的話，聯邦共和國構想似乎是最現實的構想。」但我們在實際的歷史中所看到的卻是「20年代風行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很快煙消雲散，中央集權的國民革命構想很快成為壓倒主流。對此，溝口先生文中的直接解釋是：「因擔憂各省軍隊的軍閥割據化，以及擔憂軍閥與外國勢力勾結一氣，進行分割統治，樂觀的聯邦構想——沒有中央的或者弱化中央的聯邦構想——因之沒有實現」。很清楚，溝口先生的解釋抓住了那個時代很多菁英分子的心理和言論動力所在的。但另一方面，要對一個很強的歷史趨勢在觀念上實現一個迅速翻轉，沒有廣泛的可直接支援，或可方便轉化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歷史相關要素的存在，是很難想像的。所以，也許我們可以說，在有著當時呈現為省力這一面貌歷史趨勢存在的同時，也存在著與此趨勢並存的「國力」要素，這些「國力」要素的存在有時與「省力」所代表的歷史趨勢相衝突，有時又彼此互相依存、互相轉化。

如此說，是因為我們可以隨手拈來很多這兩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例子。比如，毛澤東曾是「湖南共和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但很快轉變成支持中央集權的人；又比如，溝口先生文中所舉的：「清末紛紛刊行的宣佈新思想的雜誌如《浙江潮》、《江蘇》、《新湖南》、《新廣東》、《湖北學生界》、《雲南雜誌》、《四川》、《河南》、《江西》等，

多冠省名」，溝口先生用之證明「其時省之文化、經濟、社會的網絡空間已經形成」，誠然不錯；但另一方面，若考慮到這些雜誌的相當部分都濡染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支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又可說其時固然「省之文化、經濟、社會的網絡空間已經形成」為省力存在之重要證據，但其中所激盪的實亦包括有突破此「省力」而相當程度可劃入「國力」範圍的部分。是以要想清楚界定「省力」在清末民初的準確歷史內涵，實離不開考察它和「國力」間既相互衝突又相互支持、轉化的歷史演變關係。

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辛亥革命勝利後成立的中華民國是不是必然演變為我們所看到的四分五裂之狀，因為這也涉及我們怎麼來感覺與確定「省力」問題。比如，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後歷史參與甚深的章太炎，便曾著〈大取〉、〈小取〉篇檢討其事，根據章太炎的檢討，也根據當時很多其他當事人的理解，如果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能有比較好的合作，民國初年的政局並不必然演變至我們所看到的歷史局面。而在章太炎等人的眼裡，兩方面黨人不能有效合作，並不僅僅由於黨見的差別，實還和當時特定的一些黨人習氣有高度關係。如果這樣一些觀察確有其歷史位置，我們就不會過快把歷史所以如此結果給定一個結論，而可以建立出更多的檢討層面，從而產生對當時的歷史與政治與歷史中人的行動的更準確理解，而這反過來當然亦有助於我們更貼近歷史實際地把握與定位省力在此歷史中的位置。

我第三方面問題並不直接和「鄉里空間」、「省力」這兩個關鍵概念有關，而只是站在思想史的立場上發出的一些探問。比如，在〈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這篇閱讀材料中，溝口先生提到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時代「危機」過度反應，矯枉過正的結果，是「視中國文化為劣等，否薄自身的歷史，並將中國推向歐化」，而關於所以如此，他扼要指出是「因為中華文明圈歷史悠久，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自尊心亦尤為強烈，

民族自尊心愈強，其危機感亦愈強」。但危機感強是否必然推向對本民族文化的否定？還是此一現象本身其實便是一複雜歷史過程的結果？假如是後者，此一現象所得以發生的歷史與觀念機制本身便是需要被深入研究和檢討的。像〈激烈動盪的清末民初〉中亦提到「中體西用」，說：「所謂『體』、『用』，是中國古來有之的哲學概念，『體』為本體，『用』為作用。『中體西用』論產生於清末，主張以中國歷史傳統為本體，以西洋的工業技術為作用，而這一體用概念乃借自日本幕末佐久間象山，與其『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技術)』同義。」假使真如溝口先生此中結論所言「中體西用」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技術)」同義，那為什麼此種論述在日本現代國家建設中發揮了巨大的功用，而中國的「中體西用」論雖然影響一時，卻不久便被壓抑為歷史的伏流？命運如此不同，僅僅因為相關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嗎？還是兩者間背後所對應的知識思想內涵、精神感受內涵、行動意識內涵本身便存在著差異？

當然，進行這些思想史探問，並非為了否定社會史在一歷史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而是為了避免誇大社會史在此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一種好的思想史探問，也有助於我們去發現社會史中潛存的各種可能性，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和認識社會史。

最後，我要說的是，希望我的這些勉強獻疑，真的能有些微作用，推動溝口先生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釐清、深化在本演講中具關鍵位置的「鄉里空間」、「省力」等新創概念，真的有助於聽者更好地理解溝口先生的思考，並進一步產生引申性思考。

| 回應 |

立場與方法學的映照

鐘月岑

謝謝主辦單位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事實上這不是評論，我覺得實在非常地惶恐。因為我們在座的先進、學長都比我有資格站在這裡與溝口先生對話的，我的角色只不過是透過我們的閱讀、我們的瞭解過程，然後帶動我們在座的同學們做一些提問或者進一步的瞭解溝口先生縝密的推論與分析的學術立場。

僅僅根據一篇文章或者說一個100分鐘的演講裡面，很難能夠把他推論的學術方法百分之百地展現出來。昨天在清華的校本部的演講也是有同樣的遺憾，尤其是還要透過日語翻成中文的過程，我們可以說，這兩場演講都是非常局部的，因為他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把重要的訊息選擇性的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同學們或者其他有興趣再進一步瞭解溝口先生的思想跟他的推論、舉證的朋友，我建議就是再仔細的閱讀他的著作，而不要以兩個演講來蓋棺論定他全部的學術。從著作裡頭再去梳理他問問題的方式以及立場，我想他的立場非常重要的，昨天他在方法論的一開始講到我們做學問是要有立場的。這個立場事實上是與他的視野密切相關的。

總括來看他的文章就是說，所謂的總括，不是他所有的著作而是主辦單位所提供的一些資料。我有兩點，事實上應該是三點的回應，

由於剛剛楊貞德老師的提問我突然又增加了一個，所以我是有兩個補充、一個提問。

第一個就是溝口先生昨天的演講裡頭有一個問題，就是學生們或是老師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是關於太平天國的中心思想是均分——「公」的思想的體現。問題是要問說太平天國、太平軍或者說洪秀全本人均分的思想或者說他想要推行井田制是不是受到西方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可不可以按照溝口先生所瞭解的、所描述的中國的近代史來闡明，這是一個內發性的變動。由於溝口先生主張要有一個內發變動的視角來觀察、研究中國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我想這樣一個問題的提出，提問者事實上在方法論上是想要藉著，比如說一些考證的資料，然後去試探、去推翻溝口先生的假設，進而推翻他的立場。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提問方式可能會是一個誤解，也可能是聽一場演講的人一個即發性的一種反應。

從溝口先生的資料裡頭，基本上他的一個立場，今天的演講也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事實上他的取向、視角的提出或者說他的立場是要面對兩個敵人，也不是敵人，就是說他想要撇清的對象。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歷史的解釋，或者說像大陸學者他們從解放以來他們一貫的官方的解釋中國史、近代史的發展的態度或視角。另外一個對象他想要撇清的，基本上是一個西方漢學所導致的一種理論的沈澱或者沈積，他覺得這些都是把問題提出來然後成為理論和立論，就是說，這種提問的方式使得我們研究者跟著這樣的一個提問方向然後去追溯很多資料、去建立很多舉證。尤其西方漢學的歷史沈積在我們現在的學界裡頭，已經變成是我們學術專業裡的專有的話語、論述，甚至是形塑我們的觀念和理論架構，我們要把這些東西一一地澄清，回到所謂赤手空拳的地步、去看中國內部的歷史的脈絡。比如說從長的時間點去觀察去研究，也許我們所得出來的結論或是成果會是一個比較符

合事實的瞭解。

我現在對於溝口先生極力要撇清的西方衝擊，這樣的一個理論架構所導致的、所呈現出來的一種內發性變動的一個視角，或者是說，就他所認為中國的衝擊這樣的一個視角，我想提出一個補充。那就是，西方漢學在20世紀裡所發展的課題及其研究的成果、結論，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受到20世紀早期甚至中期中國知識分子所敘述的「中國是什麼」或「中國不是什麼」這樣的一種研究方向或者說一種視角的影響。我舉個例子，譬如在李約瑟之前，我們都一直認為中國是沒有科學的，雖然我們沒有科學，但是我們有科學精神，所以我們有能力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或者是西方式的民主，主要是說它有一個萌芽的基礎或者說是種子。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當中有一篇文章也這樣論說地。然後胡適在1933年到芝加哥去演講的時候，也是這麼樣子去描繪中國，論說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要把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帶到中國來，中國沒有科學但是中國傳統有科學精神，能靠著這樣的能力，進一步發展出來西方式的科學和民主。

李約瑟是在1950年受到陳立夫的鼓勵，才去研究中國的科學、科學史的發展。直到1954年出版《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套大部頭的書以後，中國傳統不只有科學精神，也有了科學。從1954年第一次的出版，然後到最近一、兩年都還在不斷出版續集當中，可以說這個科學史研究project目前還在持續著。所以我感覺這裡頭，溝口先生其實是想撇清，或者想要幫助我們釐清思想的脈絡以及桎梏我們的理論架構，不管是理念上或是用詞語彙上，或者是要找材料的方向。事實上我的判斷是，這其中沉澱的過程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跟西方的知識分子在西方漢學傳統中的互動相互辯證的結果，因為這些漢學家都是師承於中國知識分子，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學生都是西方漢學家的老師或師友，所以從這點去看西方漢學家的特有提問方式和問題

的關懷並非鐵板一塊，這是我一點稍微的補充。

還有另外一個補充就是針對剛剛楊貞德教授講到善舉，我想我同意，感覺上清初到清末這兩百年之間的變化，溝口先生事實上沒有那麼細緻地去探討。我覺得這其中有一點他沒有去注意、或者沒有看到的、或者說沒有提到的，就是說，其實善舉在清初財政不是一個問題的情況之下，它很可能是比較像溝口先生所描述的像是內發性變動的一種力量，換句話說，這種動力轉化成深入民間、幫助民間起來的一個力量而跟中央並存，不一定是對抗而是並存的情況。但是清朝中葉以後善舉活動不斷的增加，這與中央政府的財政困頓窮於應付，還有災荒頻繁有很大的關係，我覺得這有它的社會經濟背景，還需要更深入地去探討。我覺得有志的學者可以接續著這個方向深入研究。

接下來，我唯一的提問，就是有關於現代化作為一個政治目標，或者是溝口先生所說的世界共通的目標。溝口先生在《做為「方法」的中國》的第3章裡頭談到中國的封建與近代，他標示了五點可以作為世界文明或者是說世界各國所共通的目標，我給大家唸一下：第一個就是擺脫來自絕對性的重要權威，或解除宗教性內部權威的裡面的支配；第二個大眾可以參與政治體系；第三個從非契約性、固定性的身分上下的秩序中得到解放；第四個民眾在經濟活動中分享機會；第五個醫療與住宅維持生命的手段以及教育機會的均等化。我想如果我們按照、秉持溝口先生所提倡的、所提示的這種視野，就是以傳統中國為天下的視野，而不是以一家一己自私的立場來看中國的近現代化進程，如果中央集權的政體能夠達到這樣一個五項的共通的政治目標的話，為什麼鄉治或者是聯省自治的展現會是一個比較自然的歷史的方向？或許是溝口先生認為，鄉治或者說鄉里空間是比較自然的歷史的方向，並進而可以達成以上這五項目標？不曉得溝口先生以為如何？

我想這是對歷史的一個解釋，我還有一個比較現實的關心課題，

就是目前中國的情況，比如說生態的問題、人口的問題，那是不是還是可以按照這種傳統的鄉治、或者是紳治的復興、或者地方自治來解決。我想再回到我剛剛的提問，也就是說鄉治與鄉里空間的問題，回到溝口先生所提到的康有為在維新運動裡頭所主張的地方自治的章程，這個章程是光緒新政所提到的、所主張的一種地方自治的措施，其焦點很大的一個部分上並不是在於地方分權，而是城鎮的一些地方自治政策作為立憲體制的考量，事實上是來保護皇權的，我自己的理解是說——地方要高於中央，然後來鞏固中央的權力。基本上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國家主義者，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們的著眼點並不是在於地方分權，而是以擴大延攬政治人才，節省中央的財政支出，相對於光緒與慈禧太后這樣的權力結構制衡的考量出發，來鞏固日漸衰微的皇權。所以我很好奇溝口先生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看法，為什麼要提到日本呢？明治維新是康梁維新的典範，所以我的好奇還是回到溝口先生的自我，就是在溝口先生的視野的關照下，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日本的近現代史的定位問題。明治維新就我的理解是日本近現代史一個最光輝的時代，國力強大的同時也緊接出現了大正民主時期，但是大正十年的民主體制基本上是夭折的，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呼應剛剛楊貞德老師的回應，就是說為什麼一定要是1911，而不是1949？我想這個歷史分歧點象徵一個很大的價值取向。不曉得溝口先生能不能進一步提示他的看法和立場！謝謝！

| 討論與對話 |

從辛亥革命看中國的近代*

劉雅芳、鄭聖勳 錄音整理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持人開場 | 陳光興教授、溝口教授、各位在座的許多朋友與學生，歡迎你們來參加今天的盛會。溝口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學者，我想不需要我在這邊多作介紹，不過因為擔任主持人工作的關係，所以以簡單的幾句話說明他的背景。溝口教授是1932年在名古屋出生，曾經擔任一橋大學社會學部的教授、東京大學的教授。他的研究領域事實上非常寬廣，涉及歷史學、中國思想史，而且據我所知，對整個亞洲、日本、中國，他的著作裡都可以讀到相關的論述。他的著作非常豐富也非常廣泛，其中有幾部中譯本我想在座都特別的熟悉，像《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有國立編譯館的中譯本，這個中譯本已經相當久，譯者是林右崇)，另外是《中國的思想》(我手上的是北京出版的，不知道台灣是否有譯過，是由大陸的學者趙士林所翻譯的)，還有《做為「方法」的中國》，我想這些是非常膾炙人口，又是我們所熟悉的，當然除此之外，溝口教授還有其他的著作，我就不在這裡一一列舉。溝口教授早年在《思想》這個在日本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上，發表關於中國「公」、「私」的概念，我的瞭解沒錯

* 編註：本文為本講座於清華大學月涵堂進行的第二場專題演講「從辛亥革命看中國的近代」之現場討論與對話。孫歌教授擔任現場翻譯工作。

的話，這幾十年他陸續在這個問題上有非常精彩的研究，像是昨天在清華大學講演關於「公」、「私」的專題論文。

我覺得〔講座〕廣告詞寫得非常好，剛剛在門口還在仔細地看一遍，我覺得對溝口教授那一段簡短的廣告詞，寫個相當的扼要而且確定，就是「他不只是要研究中國思想，他要透過中國思想，回過頭再去看日本、而且反思日本」，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常常在溝口教授一些中譯本著作的自序裡面，看到他對近代日本、中國的種種現實問題的反省，我個人也深感敬佩。

王汎森 | 時間非常寶貴，現在我們開放給在座的各位提問。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問題要跟溝口教授討論，請大家踴躍發言。

邱德亮(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我想請問溝口教授一個問題，就是在剛剛演講中提出的模式裡面，城市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在西方發展裡面，政治參與和政治活動在城市裡面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但在您的解釋模式裡面，不管是從17世紀到清末民初，在這樣一段發展裡面幾乎看不到城市。所以，我想問一下在您的解釋模式裡面，城市是不是有任何角色？而就整個革命的發展而言，尤其是清末以後城市的發展，它在革命運動過程裡似乎扮演某種程度的重要性，可是在您的解釋裡幾乎看不到。

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 | 辛亥革命裡傳統的鄉治力量很大，我覺得這點溝口先生講得非常好。那麼辛亥革命會不會是傳統鄉治的迴光返照？也就是說傳統鄉治在辛亥革命做最後一次的發揮，然後它就慢慢整個崩潰；那麼1927年與1949年的內戰是不是代表傳統鄉治已經完全崩潰了，而是一個現代國家重建的努力過程？

沈松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我有幾個意見想跟溝口教授請教。第一，我想就我個人的理解對溝口教授的論述位置稍微做一點詮釋，溝口教授雖然談的是中國，但是他關切的是近代日本。我覺得如果從知識生產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溝口教授所論述的中國是不是像他說的是一個歷史全貌的、是一種歷史真正發展出來的近代？近代日本的建構是透過一個負面的他者來肯定日本現代化這一條道路，如果從這裡來看的話，那麼溝口教授今天所談的從明清到近代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用來批判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近代化經驗所建構的他者？

第二，溝口教授所談的近代中國除了從明末以來內發的變動性這條縱軸線之外，他其實也非常重視從鴉片戰爭以來西力東進這橫切面對中國的影響和衝擊。但是從溝口教授今天的報告，不太容易看到橫切面的因素對近代中國所發揮的影響。我很想知道在這論述裡面，到底這些橫切面的因素，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讓近代中國從它本身內發性的變動產生的什麼樣路徑的變化？如果假設沒有鴉片戰爭這些橫切面因素的話，那麼從鄉治這些發展出來的獨特因素會不會造成辛亥革命王權的崩潰，或者延續傳統中國改朝換代？

第三個問題，我認為溝口教授今天所談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中國的「近代」這個觀念、詞彙是不是只有中國需要做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如果從世界史觀點來看的話，「近代」對於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是不是溝口教授今天所討論的從明末以來中國獨特的發展可以說是不同於西方近代的一種另類的近代？如果是這樣的話，溝口先生的論述是不是還是在近代性論述主導之下，想找出歐洲中心霸權性近代性論述之外還有可能開發出不同的近代性論述？這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溝口教授這邊所談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從集權到分權，經由這樣一個變化導致王權體制崩潰最後走向反方向重新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民國家。除了這樣一種歷史發展，傳統中國從明末以來是不是可以開發出別種歷史發展？例如，

傳統中國天下的觀念，這所帶來的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它可以是社會主義中國這種以第三世界意識為主的國際主義想像，那麼這樣一種想像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對現代性的反思提供更豐富的資源與界定的參考座標，以上幾點向溝口教授請教。

謝婉婷（台灣大學中文所）| 剛剛教授提到，辛亥革命當時的世界潮流是要建立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中國卻是反其道而行，我在想是不是還有商榷的可能性。因為清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古人的觀念來講，它就是一個異族國家，像明末清初或清末民初，他們好像都會用「把異族趕出去」當作一個口號。像剛剛說黃宗羲對君主有批判，可是我在想他的批判是不是參雜了民族主義思想的批判，是對清朝的批判，就是他其實蠻愛國的、還是會懷念明朝的事情，像孫中山也會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所以我想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會不會是推動近代化的小催化劑？因為剛剛教授好像沒有提到民族文化的部分，這是我好奇的地方。

楊瑞松（政治大學歷史系）| 剛剛聽了各位教授的提問，我的感想是，我想起了一本書提到的「如何在中國的歷史脈絡裡面找到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我想最大的問題是回應到剛剛楊貞德教授提到的問題「到底中國的歷史全貌是什麼？」薩伊德在《東方主義》裡對西方霸權提出批判，但我想他聰明的地方是不去提什麼是真正的東方，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批判者他不去提這個，因為如果提出什麼是真正的東方他就會陷入了自己所批判的「落入一個本質式的謬誤」。所以溝口先生說的「中國歷史的全貌」是什麼？如果用這觀點來看的話，溝口教授可能要更進一步的工作才能回答這個麻煩的問題。

陳光興（亞太／文化研究室）| 我提一個很小的部分，其實也是我們

企圖爭取一件事情。就是說，溝口先生有一些突圍，在他的2004年那本《中國的衝擊》，已經部分被翻譯出來，他今天講的有一部分在這裡面，那本書提供了一個今天談論的內容在這個整體狀態裡的位置。據我的理解是，溝口先生利用了所謂的「中國的衝擊」、現在的衝擊，企圖想要扭轉一些誤解，這是其中一個環節，其實他有好幾個配套在這些環節中間以扭轉目前的理解。我們希望能夠根據這些閱讀，深入我們自己的歷史內部。今天的問題也是與各個格局相關，因此有許多問題我覺得溝口先生都沒有辦法很簡短的來回答；那我講一點點自己因為籌備這個會議，加速閱讀溝口先生的一些資料和文章的回應。我用一個比較化約的方式來講（這樣很不好，可是好像會比較簡單），我認為溝口先生的操作方式或是精髓，大概可以用一個循環的狀態來描述：他的很多問題來自於反思，例如對於日本的講法和一些內部狀況的不滿，然後下一步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對照」、或是「比較」，就是中、日相互對照，透過差異性以尋求解釋。這尋求解釋就是跑到所謂的「內在理路」，不管是中國的內在理路、或是日本的內在理路；然後這步驟做完了，又再回到「反思」上面。

這是非常化約的講法，可是我認為這幾個部分構成了溝口先生的知識狀態。可以這麼說，今天他講的是「內在理路」的這個部分，昨天他談的「中日的公與私」是在做「對照」的部分。我是很化約的這麼講，可是就大家所聽的內容裡，會察覺到溝口先生冒出一些反思。這是我覺得「反思」的思想的部分，也是我對於溝口先生的閱讀的理解，也許可以提供大家一些參考。我認為所有的講話都是有線索的，我也是呼應鍾月岑的講法。假使大家有興趣的話，其實有兩本很重要的書《做為「方法」的中國》、《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已經在台灣出版了，都是編譯館的，假如大家討論這些再配合他的其他的論文，我覺得好像大部分的問題是可以回答的。這是我的一些感想。

王汎森 | 我的研究領域和溝口教授其實很接近，不過我基於純粹好奇來問一個非常小的問題。我非常感謝溝口教授，多年來在教學上對於他的著作也非常注意，但是好像沒有材料可以多作閱讀。

溝口教授在他的演講裡面提到康南海的同人局成員有兩、三萬，同時溝口教授也有提到梁啟超在《中國文化史》裡面提到在他的家鄉的堂、會組織，這些人都是在廣東，而且在清末有這麼大規模的一個「鄉社」的現象。南海同人局，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在康有為筆記的年譜裡有提到，裡面所描述的那一種規模、那一種陣容，還有他的學生梁啟超提到的江南會等這幾個團體，我認為在當時確實是意味很深長的一些組織。我的問題就是說，這樣的現象是廣東所特有的，還是溝口教授在其他的省分有沒有注意到鄉會的這種組織？我認為應該有人去把康梁所提到的這幾個組織（如果有資料的話），到廣東做一個實際的調查。這個很小的問題就是：這是廣東當時特有的現象嗎？再來就是說，這是在太平天國逼迫、衝擊下所產生的地方組織，還是在太平天國之前就存在的地方組織？兩個小問題請教溝口教授。

今天因為問題已經非常多了，隨手記下來就可以回答兩天兩夜了，我想溝口教授也沒有辦法一一地仔細回答，我想他會就他的重點，給各位做一個說明。好，我們現在請溝口教授。

孫歌 | 我先替溝口先生說兩句，因為他現在收到的問題，包括三位評議人拿出來的問題，其實每一個問題都夠他講一個下午了，然後再配合我翻譯，我占到一半時間，只剩下25分鐘讓他回答，這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種要求，所以我在這兒有一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所以我們第一是請溝口先生選幾個問題，最能觸發他靈感的，讓他講幾句，那麼我也會盡快地傳達給大家。另外一個我的建議是，其實今天的問題，我們大家期待的不是現場解決，而是把問題拿到這兒來共享，所以提

問本身不僅僅是面對溝口先生，是我們共享這些問題，然後帶回去。可能真正的問題的深化要靠閱讀溝口先生的著作，雖然他的著作翻譯得非常有限；其實賀照田正在推動這個善舉，要不是他的壓力的話，我不會超過我個人能力的接受他的建議，把溝口先生的著作都翻譯成中文。因為我們正在推動這件事，所以大家不要急，但是如果今天的會議能夠引起大家對溝口先生的疑問及興趣，把這興趣保留到我們把這套叢書推出來，那麼陳光興的陰謀就算得逞了。現在我們還是請溝口先生給我們一些線索就可以了，要求他來真正的回答問題在時間上是不可能的。

溝口雄三（孫歌翻譯） | 今天收到這麼多問題對我來說真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因為這也是本來我到這兒講演的一個主要目的，我其實不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其實許多的問題已經隱含了答案。

我想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是辛亥革命與1949年的建國之間的關係，到底這應該怎麼來思考，這是楊教授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做一個簡單的回應的話呢，恐怕要說這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怎麼來看這兩個歷史階段。在我的歷史研究裡面，我覺得歷史家永遠不可能避免他的「主體性」問題，也就是他的歷史學、歷史觀裡主觀設定的問題——這個和我們通俗意義上的主觀、客觀的二元對立是沒有關係的。那麼，在這樣的一個主觀結構裡面，我來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我不認為這兩個歷史時期有那麼截然不同的本質差異，而且在這兩個歷史階段、歷史時刻之間，有「民國」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從我個人的歷史觀出發，我認為這是一段連續性的歷史；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野裡去看，甚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對立，也不那麼重要了。我們只能說在這個歷史過程當中，我們經歷了一個從解體到再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什麼樣的政治勢力

來完成；這是一個歷史分析的問題，但是它不伴隨著價值取向的問題。至於為什麼是「1949」年？1949年在歷史的結構脈絡裡面只是一個偶然性的時間；為什麼是「1911」年？也是一樣。至於怎麼解釋這段歷史最根本的本質、核心，我建議大家不要拘泥於這個問題本身，這段歷史到底怎麼看？有人認為不能夠實現聯邦制是因為列強外力的壓迫，所以只好走中央集權的路；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不是要回到兩千年舊的體制當中去，聯邦制才有可能實現。這當中有許多歷史觀差異的問題，在這邊沒有時間表述。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軍閥的問題——軍閥和省自治的關係。在我們使用「軍閥」這個詞的時候，其實已經包含一些現在的判斷，這判斷也包含了價值判斷。當然這判斷來源於一些是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但是因為在整個歷史的沿革過程當中，有它不同的階段性。今天我在這裡講的「省軍」和「軍閥」，其實是有差異的，省的軍隊並不等於軍閥，它發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雖然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已經預備、種下了另一個歷史階段的種子，但是我們不能拿後一個歷史階段來重新討論、覆蓋前面的歷史。那麼，在這裡我要推薦一本書，當然我想這大概沒有中譯本，所以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是東大出版會出版的，作者叫做塚本三郎，書的名字是叫《湖南共和國的建國》，我也不是記得很準了，但肯定是討論湖南共和國的。那麼，在這本書裡面有大量的史料，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史料的分析，可以有一個功能，就是把後來變成「軍閥」的概念，帶到前面的歷史裡面，把它加以調節，調節之後你會發現軍閥的前身——省的軍隊，它包含了更豐富的、另外的一些可能性。

現在回應沈松僑先生的問題。您提出的問題都非常有魅力，我很想(如果有時間的話)能一邊喝酒一邊來討論，這樣比在這裡討論更能深入。我想只在這裡回應您的第三個問題，關於「中國的近代」這樣的

一個範疇、概念的使用，這是不是過分受制於西方近代的科目，以及是不是有其他討論、表述的可能性。

在這個講演一開頭談到的在東大合作的那本書，《中國的思想》裡面，其實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為什麼說要討論這個問題至少還要30年呢？是因為在這裡面已經感覺到非常麻煩的矛盾，比如說在東大的這本書裡面，就避免了「中國的近代」這樣的詞，但是，事實上在我做的所有的論述中，我所要討論的特徵又是和西方的近代形成了一種對比關係；那麼，我覺得在今天這是一種不得已的策略，因為你有必要向大家已經習慣的這種西方的發問方式、接收問題的方式，必須要做一些妥協，你才有可能進行交流。而且為了不被誤解，大概最好的策略只是避免使用某一些字詞，譬如說中國的(地方)自治的空間，它起源於一個道德的源流，關於這樣的一些材料，我想盡量地把這些事實都釐清出來，然後讓這些事實自身構成一種「自我敘述」，但是這種自我敘述所面對的難度非常大，所以我也覺得很難用直接對抗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困境。但是關於您提到的正向的軸與橫向的軸，我在其他論文裡是有討論的。

孫歌 | 但是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討論；對不起，這已經不是翻譯了，其實是要開放這個問題裡面的「困難」，因為這些困難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困難，而不是他(溝口先生)一個人的困難。

溝口雄三(孫歌翻譯) | 還有一個問題，不好意思，這是石之瑜先生託學生轉來的問題：「您年輕時是否因經歷戰敗心情感到迷惘？請問您第一次對中國產生印象的事件是什麼？」這和沈松僑先生的第一個問題正好相關，「你是用討論中國歷史的方式，在回應日本的問題、處理日本的問題，甚至是進行自我批判」，那麼，回答石之瑜的問題也是在回答

您的問題。

戰爭結束時我12歲，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那正是日本塗改教科書的時期，當時日本中小學生的歷史、文科教科書都是被用墨塗過的，所以我們使用的教材，叫做「塗過的教材」，也就是我們的歷史觀、世界觀，發生於天翻地覆的，這樣的一個時期。這是對我來說的第一次衝擊。第二次衝擊發生在讀大學之後。第一次的衝擊實際上是外在的。世界和社會發生變化，原來是白的變成黑的，一切都發生了180°的逆轉。而第二次發生在大學的衝擊，是發生在我的內心；因為第一次意識到日本是戰爭的加害者、自己是加害國的一員。那個時候，我通過大學具體地知道日本是戰爭的加害國，突然回憶起我童年時的記憶，我大概3、4歲的時候，我的叔叔到中國去打戰，回國後帶回一張照片，照片裡是日本兵正要屠殺中國老百姓的場景。當時對於3、4歲的我來說構成了相當大的刺激，但是這個刺激在我的記憶裡封存了將近20年；在大學時代，這個記憶重新復活了。因此，第一次的衝擊是自己周圍的社會正在發生變化，而第二次衝擊是自己內心根本性的發生一些變化——於是，自己主體性的問題變成一個問題。

但是我要補充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微妙的一點：我當然是反對侵略中國的戰爭的，但是，我的中國研究並不是為了「反對侵略中國戰爭」而做。中日之間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像靖國神社的衝突，各種各樣實踐層面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完全不參與這些運動。有些學者選擇了從事社會活動的方式，但是，這不是我的方式。我想把我的方式和另外一個問題結合起來談，就是怎麼認識中國的整體結構性問題：我認為中國的整體結構並不是一個懸在空中的、觀念性的問題，我要描繪那樣的中國的整體性結構，實際上是一種抗議行動；我抗議的對象，是以「自己的歷史觀、自己的歷史敘述，來扭曲中國的歷史」的歧視性的歷史觀念。當然建立一個整體性的結構要面對許多學

理上的問題，但是對我來說，建立一種整體結構性的行為，是一個反思的行為；我選擇的反思的方式，就是進入中國的歷史，至於進入的本身會遇到多少學術上的困境，那是在學術操作裡面要面對的問題。

最後，我想對在場的年輕學子們說幾句話；我很高興你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我有個建議，希望你們能夠把這些問題一直保持下去。因為提出問題，謀求對方的解答，其實並不是提問的目的；提問的目的，是讓自己心裡永遠有問題，讓這些問題成為自己的問題，從而使它成長、發展為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這麼說好像有點狡猾。最後一句話，就是我把大家的問題再還給大家，然後一起把問題帶回去吧！

王汎森 | 我們從兩點進行到六點，已經4個小時，對於一位75歲的學者來講非常困難，實在是非常感謝溝口教授精彩的演講與回答，也非常謝謝各位的問題。這樣的場合非常好，非常有意義，也非常期待陳光興的陰謀，謝謝。

陳光興 | 感謝幾位評論人花很多時間做準備，特別是王汎森兄，花很多時間坐在這兒幫我們大家的忙，還有大家應該要謝謝孫歌！最後留下來的朋友，看到了什麼是大學者的風範。（最後這一段希望我們有錄音。）其實溝口先生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不只是他的學術，而是他樹立了一些我們很難超越的問題。我講得具體一點，也就是你看到我們75歲也不能退休的，提早退休都是賴皮的，所以看到溝口先生就知道這一輩子是搞不完的，有許多風範值得我們學習。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請溝口先生擔任這系列講座第一個講者，有許多的原因。最後還是要謝謝溝口先生和孫歌，希望他以後還有機會再來，然後就來玩吧，下一次不開會。最後我還得謝謝我們亞太／文化研究室的工作人員，謝謝大家。